

编者絮语：

纪念“非基督教运动”100周年（1922—2022年）

边缘与中心：具体研究和探索

瞿旭彤

就当今中国现有主流的思想—文化格局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理解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也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小变局”的思想前提。^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承继的法兰西—俄罗斯启蒙传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民主精神和[唯]科学意识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反对传统文化，批判宗教迷信。^②在现代民主精神（“德先生”）和[唯]科学意识（“赛先生”）被推崇的同时，^③与西方文化关联甚深的基督教（“耶先生”）却被排除在主流现代化话

^①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否认中西古今之争视野下晚清以来（甚至可追溯至康熙禁教以来）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的酝酿和准备。此外，文中的“基督教”乃是广义的，包括基督公教、基督新教等。

^② 赵盼的本辑专刊文章《人间天路历程：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经历自述研究》论及，因类似批判，很多基督徒信仰受到冲击，发生信仰转变，也有人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③ 推崇科学意识并不等于主张以科学为尊，“[唯]”表达的只是后者，而非反对对科学意识的重视。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唯科学主义的专门研究，可参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语和方案之外。^①曾几何时，基督教一度被视为现代性和自由民主的盟友，被加以赞赏和推许，从而被当作帮助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良师益友，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学视为已被现代[唯]科学主义成功批判的封建迷信，不仅在日益加剧的民族主义风潮中被当成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和文化侵略（教会学校）的同谋、帮凶和工具，而且还被看作危及中国传统政教格局的外来势力和遏制中国思想与文化复兴的显然敌人。^②

有鉴于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上述纠葛，本辑专刊以“边缘与中心”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③旨在通过聚焦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④继续开展和推进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本辑专刊倡导多学科研究进路，期待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结合具体人物、事件、现象与主题等，以“边缘与中心”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聚焦地关注和考察基督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复杂互动关系。

^① 参史鸣威的本辑专刊文章：《“神性”精神走向“边缘”与“混沌”：论五四新文学基督教叙事的空间问题》。

^② 改转自瞿旭彤：《尼采以后：今天我们如何做汉语神学？》，《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9年第50期，第159-160页。参如下两篇本期专刊文章：许俊琳的《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资本主义想象与身份认同》和褚潇白的《暧昧的批判与接续：论民国“耶稣传”写作实践》。

^③ 详参瞿旭彤的本期专刊文章《边缘与中心：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另，世界基督教研究史领域内的类似专刊，参Russell E. Martin, Barbara J. Skinner, and J. Eugene Clay,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in Eastern Christianity: An Introduction,” *Russian History* 20, no. 1 (2013): 1-7。全球经济史研究领域内的类似专刊，参Klemens Kaps and Andrea Komlosy,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Revisited: Polycentric Connections or Entangled Hierarchies?” *Fernard Braudel Center* 36, no. 3-4 (2013): 237-264，涉及对沃伦斯坦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理论性改造。

^④ 比如，吴国安：《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回应(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周刊〉为中心的探讨》，香港：建道神学院，2000年；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1992年。

本辑专刊主题文章包括五篇论文和一篇书介，其中第一篇在评述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试图为本辑专刊提供初步理论说明，其余五篇文章则试图围绕“边缘与中心”这一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之间的纠葛关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瞿旭形的论文《边缘与中心：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在批判性评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内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试图将“边缘与中心”初步理解和解释为一种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且提倡从“边缘”与“中心”交流和互动角度出发，特别是就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采取多学科的研究进路，针对具体历史人物、现象、事件和主题等进行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赵盼在《人间天路历程：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经历自述研究》中试图探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如下边缘话题：五四时期一些“具体人物”的信仰经历自述。^①这些人既包括处于教内中心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也包括处于教内边缘的普通基督徒。通过分析和梳理这些具体的个人信仰经历自述，赵盼特别探讨了他们皈依信仰或信仰转变时对耶稣人格的理解和以此改造中国社会或开出救国之方的想象和期待，由此呈现出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思潮”的回应以及对与此相关中心话语的参与。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许俊琳的论文《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资本主义想象与身份认同》关注的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时代背景下，不甘于边缘的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借着在中国现实语境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想象性挪用，在反省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时代大议题的同时，重新检讨和构建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由此重构自身

^① “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生活的研究”，或者说，“被认知（perceived）的基督教”，正是黄剑波为什么大力推荐张杰克作品的重要原因，参黄剑波：《黄序：成为罪人与力求无罪》，载《罪身成义：温州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张杰克著，新北市：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另一方面也由此试图参与，甚至影响关于改造社会和救国图存的中心话语。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褚潇白的论文《暧昧的批判与接续：论民国“耶稣传”写作实践》专门探讨和分析以赵紫宸和吴雷川为代表的民国基督教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暧昧[地]批判与接续”作为“中心”的欧洲自由主义神学传统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同时，以双重“边缘”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身份，在具体的地方性处境中，以“耶稣传”的具体写作实践回应和参与五四以来诸如国民性改造和救国图存等中心话语。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史鸣威在《“神性”精神走向“边缘”与“混沌”：论五四新文学基督教叙事的空间问题》中试图追问，“[基督]宗教精神的缺失究竟表征在五四新文学的何处”。借助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对“绝对空间”的阐释和德国基督教哲学家舍勒对“爱的秩序”的阐定，史鸣威试图“重审五四新文学的基督教叙事”，并认为，由于五四基督教叙事的世俗化倾向，绝对空间被边缘化；由于五四基督教叙事的个人主义气质，爱的空间失去秩序，第一要义从爱上帝转变为爱世人；由于五四新文学出于现实利益考量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文化路径，“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传统”被排斥和放逐到现代主流思想和文化的“边缘”，处于“中心”的五四启蒙事业也由此不得不走向失落。

本辑在最后部分收录的专刊文章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王皓对其博士学位论文《新耶稣会与近代中西学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7年）的简要介绍：《边缘扰动中心：一个观察晚清民国耶稣会史的视角》。此文通过气象学、国际汉学和中国史学三方面的具体案例，多角度和多层次地分析和展现晚清民国时期来华新耶稣会士处于“多重边缘位置”的学术活动如何“扰动”分别位于中国和欧洲的学术“中心”。

总而言之，本辑专刊特别聚焦于基督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复杂互动关系，主要呈现的研究对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在城市中、具有精英色彩，甚至掌握公共平台的基督教流派，而很

少关注和研究到具有保守派甚或基要派倾向、在乡村里、偏向于社会中下层的基督教流派。^①这或许也与本辑专刊对“边缘与中心”的“与”的强调密切相关。处于边缘的中国基督教，有的选择远离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和中心，甘于边缘，专注于宣讲灵魂的得救，有的则试图进入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和中心，试图在主流和中心证明基督教与思想、文化，甚至政治的密切关联和深度参与。^②

在上述六篇专刊文章外，本辑还收录有四篇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文章、一篇关于世界基督教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研究文章，以及一篇关于西欧中世纪政治权威神圣性建构的研究文章，或许可以作为上述五篇文章所运用的“边缘与中心”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呼应。

如同杨靖《上帝的回音：李提摩太对中国大乘佛教的解读》一文所揭示的，李提摩太作为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参与者，试图研究和理解作为中心之边缘的中国大乘佛教，并且将之视为“与基督教联合的典范”。又如赵婷和李晓晨《调和：徐宝谦论基督教与中国之关系》一文所论述的，正是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本色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徐宝谦试图“调和”作为边缘的基督教与作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特别强调基督徒应提升自己的“人格感力”。该文还特别批评，徐宝谦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作为中心之中心的儒家文化的关注，而不太关注作为中心之边缘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他组成部分”，比如，道家、墨家和佛家。

曹南来和雷蕾的文章《当代基督教慈善文化与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性建构》指出，当代中国基督教慈善团体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基督教群体，试图摆脱边缘状态中的“他者”身份，从而朝向和融入中心，“建

^① 参陶飞亚、杨卫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193页。

^② 赵盼的本辑专刊文章《人间天路历程：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经历自述研究》在开篇处和其他多处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构中国化基督教公共性身份认同”。张劲夫的《基督教中国化实践的文化逻辑：以云南拉祜族L村为例》从宗教人类学角度出发，在近代边疆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关注作为中国文化（地理/政治等）中心之边缘的云南拉祜族L村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实践，并且认为，外来的和边缘的基督教信仰与作为中国文化（地理/政治等）边缘之中心的拉祜族本土信仰形态“互动交融”，从而呈现出“现代宗教信仰交织重合的多元文化局面”。

陈明丽的《对抗、从属抑或共生：五旬节-灵恩运动与现代性关系的再思考》一文在世界基督教研究的全球视野中，从对抗、从属和共生三个维度，思考和探讨原处于世界基督教边缘、如今却居于中心的五旬节-灵恩运动与现代性之间复杂且多元的互动关系。杨军的《西欧中世纪政治权威神圣性的基督教叙事》则试图梳理与解读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王权的神学叙事及其流变；在中心与中心的漫长互动中，关于政治权威的单一神学表达逐渐转变为教权和王权二元并行的神权政治理论。后两篇之所以收入专门关于汉语基督教史的“法流十道”栏目，是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我们看待中国基督教史的参照和镜鉴。

2022年秋，恰逢“非基督教运动”100周年，^①本刊作为专门致力于基督教研究的学术刊物，特以“边缘与中心”专刊纪念这个中国基督教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希望以此为审视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提供一个视角，为宗教中国化建设做出一些菲薄的贡献。

^① 参见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第68-89页；另参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4-190页。

编者絮语：边缘与中心

特邀执行主编简介

瞿旭彤，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guest editor

Thomas Xutong Qu,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Email: quxutong@mail.tsinghua.edu.cn